

阁臣更替与景泰内阁政治地位变迁

余劲东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明代景泰阁臣通过一系列内部人事调整,使内阁的政治地位得以加强;同时,它积极扩展内阁的权力,使内阁的机构趋于齐备、地位得到提高,票拟成为制度;景泰内阁所采用的阁臣推荐继任者、进士入阁等阁臣选拔方式为后世所沿用,在明代内阁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景泰内阁;阁臣;职能;地位

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9)03-0093-04

自明成祖朱棣(1360—1424)设立内阁后,内阁便作为辅政机构和决策中枢,长期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学术界有关明代内阁的研究为数众多。王其桀《明代内阁制度史》对内阁制度的发展与流变及其政治作用予以关注^[1],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对内阁与外部行政机构的权力互动进行了充分研究^[2],洪早清《明代阁臣群体研究》力图探讨阁臣群体的构成状况、政治作为与人格特征^[3]。尽管如此,但明代内阁问题仍有许多内容值得研究。例如明景帝朱祁钰(1428—1457)在位期间的内阁政治,所受到的关注便明显不足。

清代以来,人们对景泰内阁的评价一直不高。清修《明史·刘忠传》称:“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4](P4829)}在对景泰之前的“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和景泰之后的“刘、谢”(刘健、谢迁)给予赞赏时,对景泰时期诸如陈循、高穀等阁臣却不以为然。在今人研究明代内阁制度的著作中,王其桀认为:“景泰初期的文渊阁臣的职司,大致又回复到永乐初期的情况,比之正统初年不是向前发展了而是后退了一步。”^{[1](P96)}张宪博指出:“景泰阁臣每遇军国大事动辄退避三舍,成化、弘治朝内阁职能的萎缩、阁臣地位的下降,都与内阁在景泰年间一系列事变中的作用不无关系。”^{[5](P288)}洪早清认为:“(景泰)阁臣在关键时刻没有发挥比较有效的作

用,没有值得称道的建言和献策。”^{[3](P55)}结合以上观点不难发现,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景泰内阁在整个明代内阁制度史上的地位无足轻重,甚至职权较之以往出现了大幅度倒退,但事实并非如此。笔者拟从景泰内阁的内部构建和外部扩展两个角度切入,来探究景泰内阁的真实地位所在。

一、景泰内阁的内部构建

(一)景泰内阁的人员构成

阁臣通过“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6](P9755)}的方式对政治运行加以干预,是内阁制度得以运转的关键所在。探讨景泰内阁的政治地位,无疑要关注当时内阁成员的组成情况。

明代内阁制度创建伊始,阁臣几乎全由皇帝亲自选任。但英宗即位之初年龄尚小,朝中由先朝老臣“三杨”辅政。鉴于幼年皇帝难以亲自选任阁臣,为防止宦官王振对内阁人选的干预,“三杨”向皇帝举荐大臣入阁,阁臣的选拔方式由此改变。土木之变发生时,留守北京的阁臣有陈循(1385—1464)、苗衷(1370—1450)与高穀(1391—1460)三人,他们全为“三杨”所举荐。笔者通过查阅官员履历发现:杨溥是陈循在永乐十二年(1414)乡试时的座师^{[7](P3768)};而苗衷、高穀也是“三杨”所赏识的青年官员。早在正统元年(1436),“三杨”便推荐陈循、苗

收稿日期:2019-0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文官考察决策与运行机制探析”(18FZS004);湖北省教育厅项目“明代湖广进士群体研究”(18Q042)

作者简介:余劲东(1987—),男,湖北武汉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衷、高穀、马愉、曹鼐五人“侍经筵”，成为皇帝的伴读之臣^{[8](P464)}；正统五年(1440)，又推荐苗衷、马愉、曹鼐三人进入内阁^{[9](P444)}。虽然当年仅马愉一人入阁，但到正统十年(1445)，“三杨”推荐“侍经筵”的五人皆已先后入阁，不难发现“三杨”对于阁臣选任的重大影响力。

正统年间，“三杨”先后执政。景泰初年的陈循、高穀内阁延续了“三杨”由现任阁臣举荐继任者的做法。土木之变时，阁臣曹鼐、张益歿于战阵，为维持内阁人数的基本固定，陈循、高穀一同推荐彭时(1416—1475)、商辂(1414—1486)进入内阁^{[8](P6415)}。而新任阁臣与举荐人之间同样有过交集：陈循是商辂在正统十年(1445)会试、彭时在正统十三年会试时的读卷官；高穀则是彭时在正统十三年会试时的主考官。此外，陈循和彭时还是江西吉安同乡；正统十二年朝廷设置东阁，选拔十名进士入阁读书，商辂得入十人之选，而陈循又是这十人的教习^{[8](P5126)}。师生、同乡情谊所构成的多重联系，很可能对彭时、商辂获得入阁资格产生积极影响。

景泰时入阁的其他大臣，也大多与时任阁臣关系匪浅。苗衷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荣休后，江渊(1400—1473)立即入阁来填补空缺。江渊在入仕之初的发展并不顺遂，尽管早在宣德五年(1430)已成为进士，但直至正统十四年(1449)仍在翰林院担任侍读，沉落下僚近二十年之久。在景帝继位之际，江渊因固守京城的方略而受知于景帝，陈循立刻借此机会推荐江渊，使其从侍读的岗位上连升数级，任职刑部右侍郎^{[8](P6176)}。而这一异乎寻常的人事变动实有渊源，早在江渊读书东阁时，陈循正是当时的教习。

景泰二年(1451)入阁的王一宁、萧鎡和时任阁臣同样有较好的交谊。江渊推荐王一宁时上疏：“王一宁学识老成，持心端谨，旧官翰林，侍讲经筵，若擢馆阁论思之职，必能启沃圣聪，裨益世治。”^{[8](P7369)}而在王一宁入阁时，陈循毫不讳言“方君之入也，余窃自庆得所助”^{[10](P18)}。从他公开的奏疏和私人书信中，都表现出他对王一宁入阁的殷切期待，三人的交谊可见一斑。此外，王一宁是时任阁臣商辂的座师，与阁臣高穀自正统初年起便在翰林院一同担任侍讲^{[8](P1416)}，有多年同事经历，入阁自然能够被时任阁臣普遍接受。而萧鎡和陈循同属江西泰和县人，同在京城为官十余年，交谊可想而知；萧鎡与江渊早在宣宗时期便一同就学^{[11](P4101)}，英宗初年又一同升任编修^{[8](P268)}，十余年的同学和同事关系，又同

处近密之地，即使难以查知二人的交谊是否深厚，也可以推断双方至少都有维持表面和谐的需要。

至景泰三年(1452)，阁臣江渊因奔丧而出阁，高穀在阁中势单力孤而援引王文入阁。《明史·王文传》称：“是时，陈循最任，好刚自用。高穀与循不相能，以文强悍，思引与共政以敌之，乃疏请增阁员。循举其乡人萧维祯，穀遂举文。而文得中官王诚助，于是诏用(王)文”。^{[4](P4516)}王文入阁虽然得益于宦官帮助，但高穀极力推荐也是不争的事实，《明史》的作者就直接指出：“王文由(高)穀荐。”^{[4](P4534)}

在厘清景泰年间内阁的人员构成后，我们可以看出，陈循内阁基本延续了“三杨”时期由现任阁臣举荐继任者的做法。以往由皇帝亲自选任阁臣的传统虽然在表面上得到维持，但陈循等阁臣却能通过自己的荐言，使皇帝目光聚焦的范围大幅缩小，甚至直接指名推举特定官员入阁。

(二)“精英入阁”局面的形成

虽然景泰阁臣间依靠师生、同乡等交谊构成紧密联系，但这些外部因素不足以构成以上诸臣入阁的唯一理由，他们自身极高的文化素质与较深的年资，也是得以入阁的另一关键因素。

景泰阁臣绝大多数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原有阁臣陈循是永乐十三年(1415)状元，高穀是同年的庶吉士，苗衷则是永乐九年榜眼。他们所举荐的继任者也全是科举考试的优胜者，商辂是正统十年状元，彭时是正统十三年状元。此外，宣德八年(1433)，“帝(明宣宗)命杨溥合选三科进士，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萧)鎡为首”^{[4](P4515)}。江渊则是早萧鎡一届的庶吉士。另外两位阁臣王一宁、王文，虽然科名不显，但他们都是有近三十年为政经历的进士和官场前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景泰年间，同时也是整个明代内阁制度史上入阁时间最短的俞纲，仅入阁三天便主动请求调离，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俞纲是景帝在郕王府的旧僚，但并非进士出身，与在任阁臣少有交集。他在入阁后迅速请辞，很可能是因为难以适应当时业已形成的“精英入阁”的政治环境。

总的来看，整个景泰朝，科举优胜者方可入阁的理念贯穿始终。虽然这是“三杨”时遗留下来的权宜做法，但景泰阁臣通过数年的努力，使这种权宜之计逐渐达成被朝臣认可的通例。此后，入阁者虽然并非像景泰年间这样状元、榜眼济济一堂，但至少需要有进士身份，类似内阁制度肇建伊始的那种举人、监生得皇帝宠幸便可入阁的情况再难出现。《明史·

选举二》认为:“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4](P1701~1702)}但通过对景泰年间内阁成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阁臣选任方式,早在景泰年间已初见端倪。景泰内阁先后十位阁臣,九位都出身进士及翰林院系统,唯一非进士非翰林院出身的阁臣俞纲,入阁三日便主动请辞。

二、景泰内阁的外部扩展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景泰内阁通过内部人员和相关制度的调整,使之成为明代文化精英的聚集地。与此同时,景泰阁臣也开始对具体行政事务施加影响。

(一)战守、迎复与易储

如前所述,过往研究者往往认为景泰内阁在政治上的作为比较有限。但若结合景泰政局来看,并非完全如此。景泰朝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三:即面对也先入犯的战守问题、迎复英宗回銮的规格问题及改换皇太子的易储问题。

就战守问题言之。尽管内阁阁臣作为书生,难以上战场同入犯的蒙古军队近身搏杀,但他们表现出坚定的抗争精神。土木之变发生时,“人心汹惧。(陈)循居中,所言多采纳。……也先犯京师,请敕各边精骑入卫,驰檄回番以疑敌。帝皆从其计。”^{[4](P4513~4514)}作为内阁首臣的陈循积极调度,彰显了抵抗外敌的坚定决心。而江渊也因为“极陈固守之策。遂见知于(郕)王”^{[4](P4518)},迅速得到升迁并最终获得进入内阁的资格。面对朝臣中甚嚣尘上的南迁避敌之议,刚入内阁的商辂极力谏止。内阁诸臣团结一致,为固守京城作出舆论宣传,并积极进行战守筹划,对朝野上下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具有积极意义。

就迎复问题言之。景帝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对迎接身处瓦剌的英宗回銮之事并不热衷。即便在蒙古方面明确表示放还英宗时,景帝仍纠缠于迎驾的礼节问题而犹豫不决。尽管圣意暧昧,但阁臣高穀坚决主张以厚礼迎回英宗,欲派商辂亲赴居庸关恭候英宗銮驾。正是阁臣们的坚持,让明帝国的君王没有长期以俘虏的身份蒙受羞辱,而与圣意相左的阁臣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惩罚。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事件,对于内阁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阁臣不必为保全自己的地位而对圣意曲意逢迎,而是坚守政治伦理上的忠诚。

让景泰阁臣最受非议的莫过于易储问题。易储之议发生于景泰三年(1552),当时景帝准备废掉英宗长子朱见深(1447—1487),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1448—1453)为太子,希望得到阁臣们的支持。《明史·陈循传》记载:“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陈)循及高穀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半之。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加兼太子太傅。”^{[4](P4514)}从景帝“内畏诸阁臣”,可以看出景帝早已知晓阁臣可能对易储问题存在反对意见,所以以公开“贿赂”的方式来求取阁臣们的同意。景帝给予赏赐之时,并未明确表示这一行为是为易储所作的准备,因此阁臣们难以拒绝皇帝的赏赐;在阁臣刚刚得到金银和陞擢后不久,景帝再提出易储之议,阁臣们显然难以进行谏诤。面对易储一事,即使是当时影响力如日中天的于谦(1398—1457)也未置可否,因此对景泰阁臣的无动于衷也不应过分苛责。仅因易储事件上的无所作为而将景泰阁臣在政治上的成绩一概抹煞,实则有失公允。

(二)机构扩张与地位提升

景泰阁臣对明代内阁制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它完成了内阁权力的扩张以及地位提升。内阁制度肇建之时,阁臣被视为“论思之职”,主要作为皇帝的顾问,通过对皇帝的进言来影响政治决策。至“三杨”时期,内阁取得票拟权,阁臣需要对政务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以供皇帝裁决,这无疑加重了内阁成员的政务负担。面对阁臣人手有限,难以有效应对繁杂政务的困境,陈循等人请求设置制敕、浩敕两房中书舍人。^{[1](P98)}两房中书舍人可以为内阁成员提出可供参考的政务处理意见,阁臣才能从繁杂的政务中抽身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对政务的宏观操控方面。两房中书舍人的设置,实则还将票拟这种政务决策方式以制度形式予以固定,完成了“内廷机关外廷化”^{[12](P23)}的重要一步。

永乐至正统年间的阁臣,虽然或由皇帝亲自指定,或由在任阁臣推荐,但这些阁臣的共同特点在于品级较低,在朝参之时必须位列各部尚书之下。这种局面在景泰时期有所改观。景泰年间入阁的七臣,除彭时、商辂因入仕未久而官品较低外,萧鎡为国子监祭酒,江渊、王一宁、俞纲皆为侍郎,皆属于中高级官员,王文的入阁更有里程碑意义:“二品大员入阁自(王)文始。”^{[4](P4516)}在景泰之后的明朝,除极少数皇帝格外赏识的官员之外,得以入阁的官员通常需要担任到较高的品级,类似正统之前那种低级官员入阁辅政的情况极少发生。阁臣的品级提高

后,便不甘在朝参时位居各部尚书之下。景泰二年(1451),陈循以“内阁系掌制造机密重务衙门,近侍之职,莫先于此”^{[8](P7419)}为由,请求抬高内阁班次。景帝批准了这一奏请,令“内阁学士序于尚书、都御史上”^{[13](P216)},从此将阁臣位列六部尚书之前,作为制度予以固定。

经过机构扩张与班次上升,内阁的影响力得以增强,希望更多地插手政务处理和官员选任。景泰四年(1453),山东巡按御史奏称:“朝廷设立六部分理庶政,又置馆阁文臣以备顾问者,盖俾协心参议,上陈可否而后行也。今六部各官,或偏执己见……臣愿自今各部常事俱径行,若吏部推选内外重臣,法司发落矜疑重囚,户部整理边储,兵部选将用兵,俱令会同内阁大臣计议可否,具奏行之。”^{[8](P8236)}作为七品御史,同时弹劾六部失职,公开为内阁争夺权力,很难想象阁臣在幕后扮演了何种角色?景泰阁臣已经不再满足仅作为“论思之职”,通过向皇帝进言献策的方式来履行职权,而是积极进行政治权力拓展,希望对具体政治事务发挥影响力。由此,在明代政治史上影响深远的阁部之争开始显现。

此外,景泰阁臣还通过推荐六部尚书、侍郎人选的方式,试图间接控制重大政务的决策和执行,这一做法也为之后的阁臣群体所广泛采用。在景泰之前,阁臣很少直接举荐各部要员;至景泰时期,阁臣开始广泛干预六部尚书的选任,尤其对吏部、兵部、礼部的干预格外突出。其时,吏部尚书王直(1379—1462),礼部尚书胡濙(1375—1463)在各自的部门深耕多年,兵部尚书于谦因北京保卫战而深受景帝信任。正统十四年,陈循以“欲为六卿得人”为理由推荐何文渊^{[8](P6339)},何文渊(1383—1457)虽未直接成为六卿,却因之升任吏部侍郎;至景泰二年,又以王直年老为名,令何文渊兼任吏部尚书来辅佐王直;何文渊去位后,又令王翱(1384—1467)作为吏部尚书来辅佐王直,导致景泰时期的吏部出现了明代政治史上罕见的“一部两尚书”现象。在兵部,陈循多方压制于谦的权力扩张。北京保卫战后,陈循即举荐罗通(1390—1470)总督团营,以此削弱于谦的权力^[14],之后又举荐石璞以及景帝郕王府僚属仪铭赴兵部任尚书,兵部也与吏部一样,保持着“双尚书”的格局。胡濙自宣德年间即已担任礼部尚书,至景泰时在礼部任职已有二十余年,其地位难以动摇,于是阁臣们使用举荐礼部侍郎的方式对其进行约束。

三、景泰内阁的地位和影响

明代内阁在建置初期,阁臣的选任、内阁的职责

都没有明确规范,导致内阁权力的扩张不受制度的约束。因此在景泰年间,无论资历、辈分都比不上五朝老臣“三杨”的陈循、高穀等景泰阁臣,利用政局动荡的契机,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面对政治危机、新帝即位与于谦权重等现实问题,景泰阁臣一方面积极进行内部建设,通过安排自己认可的亲信入阁的方式来稳固内阁的人选,巩固自己的决策中枢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行使举荐权来干预六部主要官员的任选,试图间接干预六部的行政。这一做法不仅将“三杨”时期内阁的票拟职权通过制度方式予以固定,还使内阁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对六部行政的影响力增强,使内阁在处理国家政务时的话语权越来越强。虽然景泰诸阁臣在位时间并不长,但景泰内阁为明代内阁政治发展所作的贡献基本保存下来,景泰阁臣中的商辂、彭时,在天顺、成化年间成为与“三杨”齐名的贤相。

由此可见,景泰内阁在明代内阁政治的发展史上,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将“三杨”所树立的内阁权威进一步提高,这对于明代内阁政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王其渠.明代内阁制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3]洪早清.明代阁臣群体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4]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6]叶向高.明神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 [7]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 [8]李贤,等.明英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 [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0]陈循.芳洲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1]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 [12]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13]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4]洪国强.论于谦与景帝君臣关系的变动及其对土木之变后京营领导体制重建的影响[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二辑)[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